

# 张角：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

## 引言

我们时代最深的压迫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极度“无权”的状态，人民变成了“屁民”竟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纵观全世界，全球的统治者奢侈淫逸，相互在比烂，整个社会在全面溃散，恰似一个臭气熏天的污泥潭。这种无权的状态伴随着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陷入了低潮。不去挣脱掉这种状态，就不足以使人民恢复革命信心，就不能摆脱弥漫在污泥浊潭里的政治冷淡主义。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呼之欲出的基本结论：与土地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不同的是，我们时代剥夺剥夺者的核心在于夺权，夺权即当代翻身的要义。

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夺，首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剥夺资本权益，靠边站阶段），然后是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的剥夺（损有余而补不足，清账阶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整体，剥夺反动分子的人身权利，铁拳阶段）。次第演进，螺旋上升，这是我们时代最后的斗争。

## 一. 历史经验

在土地革命时代，要消灭村庄里的地主相对容易，农村是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单元。就历史经验而言，剥夺地主的途径一是土地，二是财产。对于地主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剥夺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反而因为这种剥夺，进一步激发了生产力。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这种剥夺就不能生搬硬套了。

工人占领了工厂，停工容易开工难。生产资料无法平均分配，除了涨工资分现金，分配住房这些自发的经济斗争手段之外，似乎不如农业生产那么直接，那么立竿见影。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开放的统一市场之上的缘故，这种统一市场造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特点是：联系广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革爆发时期的上海，计划经济模拟了这个统一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模拟了资本家的角色，因此通过文革的演习，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剥夺剥夺者是如何进行的，被剥夺者会有哪些反扑，正确路线是什么，错误路线又是什么。

可以设想，工人被压迫太深，压抑太久，各种自发斗争势必如冲天怒火般爆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集体所有制的“大集体”工厂，民办小集体里的弄堂生产组要求加入工会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能吃上铁饭碗。回乡支农的职工要解决户口问题。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小商小贩个体户要求改换体制身份，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保障待遇。全民所有制的学徒工要求按照政策补发工资，职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工资级别，同样要求补发工资等等。

与这些诉求相匹配的行动轨迹是：港口停工，铁路运输不畅，导致停产待料，存煤量下降，发电量下降，自来水供应受影响，粮食供应下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群众，全都躲起来了，以生产的无指挥状态向群众示威，对抗群众，对抗革命。明明是走资派造成了各种制度上的不合理，造成了极其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却想浑水摸鱼，把生产秩序混乱的结果赖在革命造反行动上。

接下来走资派各种补发工资的签字生效后，造成银行提款挤兑，开始波及到金融秩序，多余的货币使各类商品脱销，住房作为一种看得见的资源也被提前分配。这些现象和土地革命期间的分配不一样。因为后者是群众大会斗倒地主之后的分配胜利果实。而现在走资派只是躲起来了，在没有斗倒走资派的情况下，提前进行分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策策略上的缺失。

所以工总司在1967年1月7日签发的《紧急通令》弥补了政策上的缺失。这个通令刊登在1月14日的《工人造反报》上，是第一张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通令指出：“把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从而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造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钱”的反……工人们同志们应以长远的革命利益为重，切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

1月8日晚，上海的23个群众组织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9日刊登在《文汇报》上，通告指出：“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

1月11日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给上海工总司等群众组织贺电，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贺电是一篇光辉的马列毛主义文献。贺电指出：“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要有了组织和政策策略上的保证，生产秩序恢复起来是很快的。以铁路运输恢复为例：由于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度所的调度员大多参加了保守派的赤卫队，大批的离岗、告状，躲避批判，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当起了临时乘务员，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把懂得运输业务和调度工作的骨干集中在一起接管了调度室。这一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春桥同志对这些骨干转述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把关于接管上海车站的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

春桥同志总结上海的经验就是：

在上海，工厂夺权，一开始就明确应夺取哪些单位。有些地方就是要拼命地夺，调动全市力量夺。比如火车站，码头，电报局，电厂，水厂等决定全市的要害部门。这些单位的造反力量薄弱，可以调动外来力量。这样，他们要起来造反，交通还是畅通，全市还是有电，人民有饭吃，有照明，人民就不会反对我们。

历史经验是一种模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各种特殊的条件，这些特殊条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时代的斗争已不可能回复到那个模拟状态。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站在后头，只是做当前自发经济斗争的尾巴和观察者，那么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必然重现，而我们也无法上升到新的斗争阶段。如果站在这些自发斗争的对立面，那无疑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帮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勇敢地担负起领导这些斗争的责任，学会使用组织的工具，政策策略的工具，使自发的斗争变为自觉的斗争。

## 二. 当代剥夺

当代剥夺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剥夺依据，这涉及到《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中所做的阶级划分。

可以设想，当代的阶级划分会有更多的难点和盲区需要正确的政策策略去厘定。这不是一个书斋臆想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实践的问题。例如土改中，区别富裕中农和富农是个难点，农村里的游民，江湖郎中，铁匠，阉割猪羊的劊匠等等阶级划分又是难点。土改时通过自报公议，民主讨论，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在70年前中国一个封闭农村里发生的事情。对比土改，当代这样的难点和盲区呈指数型上升，只能依靠群众智慧来解决，而不是知识分子关起门来闭门造车。

《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导言里的对比表只是一个粗略的指南：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敌	地主	资产阶级
敌	富农	小资产阶级上层
友	中农	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办公室结构）
我	贫农，雇农，工人	无产阶级（工厂结构）

复辟后的中国有最庞大最苦难的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上层，最卑鄙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整个中国犹如灼热炙烤的人间地狱，而阶级斗争的岩浆要把这一切丑恶统统毁灭殆尽。

其二是剥夺步骤，可以参看两个造纸厂的占厂事例，一个是郑州造纸厂，一个是韦柏尔格造纸厂。

这里都涉及到占厂后进一步的战术。前者基本上是失败的例子，后者在战术上有建树。参照过去工农红军筹款的基本经验，大致采取逮捕资本家，对其罚款或缴纳赎金。既可以是针对个人的赎金，也可以是针对工厂的赎金。韦柏尔格造纸厂则是在罢工委员会领导拒绝资方的进厂接管。他们在控制工厂以后，立即开始扩展势力范围：8000人的小城迅速处于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执委会每天处理居民楼供电、水、气、暖等市政问题，规定一般食品出售价格，在工厂食堂组织免费伙食（许多困难工人家庭因为长期不开支，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卖家俱也没人买：小城里没几个阔佬），工人纠察队取代地方公安负责治安。小城内的有线电视被工会接管，每天通过电视台汇报工作。

按照这些已有步骤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顺利掌握生产资料，使之正常运转。反之，仅仅停留在罢工层面，则运动容易被束缚。

我们都知道迪威信的吴贵军事件，吴贵军和工人选择了用罢工的方式维护权利，以尽最后的努力要求与工厂谈判，目的的只是拿到法律规定原本应该属于工人的合理赔偿。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过依法维权，先是与工人联名写信给深圳当地的劳动部门和法院的法官，要求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工人面临的情况，希望在企业搬迁变动的情况下工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合法的保障并能够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同时搬厂的行为不会影响和伤害到工人。

迪威信全厂300多名工人，几乎全员参与罢工，吴贵军是被工人们推选出来首席谈判代表。可是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因为资本家并不愿意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甚至不愿意出面处理问题，所有具体的谈判事情都是交由律师处理。部分工人感到被忽视，丝毫得不到尊重，在谈判首日即冲出马路阻塞交通以表达不满，部份工人则到工会等政府部门求助。这样一个温和的过程却被定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由此也可以发现由罢工转向剥夺，亦或是始终停留在罢工层面，这两者策略之间的差别。

### 三. 斗争图景

我们按照《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里的第二篇、第三篇里的一般模型和具体模型加以展开，具体演绎革命的舞台。

我们知道：资本周转是包含流通与生产两段时间的，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流通与生产的矛盾尖锐到无以复加，这背后体现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严重背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流通依附于生产；在资本主义的下降期，帝国主义阶段的初期，流通独立于生产；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生产依附于流通。我们把生产剩余价值的地方称为工厂结构，把发现并实现剩余价值的地方称为办公室结构。工厂结构并不只存在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也有工厂结构；办公室结构并不只存在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也有办公室结构。

假设专注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家邓与专注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家江都被《M2》里的狐狸集团收购，这其中的上市、换股、吸收合并等细节可参考《资本市场诸现象概述》中相关描述，总之此时的狐狸集团已经是个庞然大物，最高总裁狐狸郭已经和邓、江在一个董事会里含情脉脉，和谐一家亲了。我们着重对照狐狸集团的职级体系，以此建立阶级分析的模式。

“狐狸集团”职级职能体系表

职级	行政管理类	营销类	研发与工程技术类	生产技术与操作类	专业辅助支持类
E1				作业员、焊接工、IC封装员、搬运工	清洁工、园艺工
E2	组长			品质检测员 (IQC, FQC, OQC等)、物料员、搬运工、IE、SQ专员、设备工	宿舍管理员、叉车操作员
E3	班长、副班、资深组长		初级技术员	高级班组长、仓管员、高级仓管员、IQC、物控技术员	保安员、物控网络技术员、电工助理
E4	资深班长、拉(线)长			生产文员、仓库文员、品质文员、实验室文员、高级仓管员、物控文员	采购文员、人事文员、财务文员、行政文员、前台文员、叉车司机
E5	储备干部(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资深拉(线)长	销售文员、商务助理、船务助理	研发文员	生产操作类中级技术员、物控员、生管、文控文员、资深仓管员、工程文员、IQC文员、ERP系统文员	司机、秘书、中高级网络技术员、翻译、档案管理员
E6	班前、保安队长	跟单员、高级销售文员、国内销售业务员	研发工程类中级技术员(含一年以上工作经验和新人转正员工)、绘图员、高级文员	高级文员、高级PMC	高级文员、高级司机、高级档案管理员、采购员、助理出纳员、初级电工、专员、初级会计、初级审计员、人事助理、行政助理、安全主任
E7	高级班前	船务、单证、物流专员、报关员、高级跟单员、国际销售业务员	高级技术员、高级工程师	资深PMC、高级技术员、助理平面设计	资深司机、高级采购员、高级网络技术员、高级秘书、高级翻译
D1	资深班前、车队队长、副主管	高级业务员、高级船务、单证、物流专员、资深文员	资深文员	各类助理工程师、主管助理、平面设计、资深文员	助理审计师、助理会计、高级企划专员、高级法务专员、高级企业文化专员、高级文案专员、中级电工、助理工程师、出纳员、资深文员、高级招聘专员、高级培训专员、高级助理
D2	部门主管、经理助理	资深船务/单证/报关员、销售主管、报关主管、高级跟单	研发工程类助理工程师	体系工程师、SOP、QE工程师、PE工程师、IE工程、IQC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电子工程师、模具工程师、售后工程师、高级平面设计	资深秘书、资深翻译、资深采购员、采购工程师、网络工程师、系统工程师、审计师、会计师、高级出纳员
D3	高级主管、副经理	业务经理、区域经理、资深业务员、高级营销类主管		资深平面设计	高级电工、资深专员、资深助理
D4	研发类主管		研发工程类(结构、工业设计、测试、知识产权)工程师、项目经理		主办会计、高级审计师
C1	资深部门主管、部门经理、总办主任	资深营销类主管、报关经理、船务经理、外贸经理、高级销售(业务)类、市场类、品牌策划类经理	研发工程类(软件、电子)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证券事务代表
C2	工程技术类经理、财务经理、企划经理				
C3	厂长、副总监	营销市场类副总监	研发类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	资深工程师	资深工程师
C4	研发类经理、高级部门经理	资深营销(业务)类、市场类、品牌类经理	研发工程类资深工程师、高级项目经理		
B1	研发总监、技术总监、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审计总监、生产总监、品质总监、行政总监、资深经理	营销总监、市场总监	副总工程师		
B2	常务副总、技术副总、生产副总、供应副总、执行副总、总经理助理	营销副总	总工程师		董事会秘书
A	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				

在狐狸集团，生产技术与操作类职能包括：生产、品质、生产工程、实验室、物控、仓库、售后。而专业辅助支持类职能包括：人事行政、采购、财务、审计、秘书、金融、上市、法务、企划、网络。

为什么这张职级职能体系表可以建立阶级分析的模式呢？

其一，它全面。狐狸集团足够大，如果它把“专业辅助支持类职能”和“研发与工程技术类职能”外包出去，它可以成为一群服务类小公司的甲方，而现在它们都作为集团的一个部门，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

其二，它狡猾。专业辅助支持类既包括了清洁工，又有董秘，然而我们作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后，可以发现他们完全是不同的阶级！而这个职能类别里的E3、E4、E5、E6存在着大量的分析难点与盲区。只有群众运动才能把这里面的细节完全搞清楚。

其三，它扼要。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高度复杂，但是狐狸集团却把工厂结构与办公室结构都包括在内，必要的生产流通职能无一遗漏。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光怪陆离，狐狸集团提供了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不必去刻意分析“网红”是什么阶级，狐狸集团帮我们把重点都抓住了。

从阶级分析到划分阶级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这里面的政策与策略正如开展革命战争的战略与策略一样，都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首先要予以考虑的问题。从E1到E4之间建立巩固的代表会议，是整个运动发起的关键。这样的代表会议必须经过多次的新陈代谢才能得到巩固。以往的自发斗争也有类似的代表会议，但是仓促间就直接去和资本家交锋了，靠着勇敢与团结间或也有胜利，然而最终归之于失败，原因就在于自发的代表会议并没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缺乏合理的战术配合。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广大农村，只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能调动农村的广大人民支援革命战争。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反复的实践才能确立起来的。例如究竟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地主全部和富农出租土地，还是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呢？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还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呢？所以没有政策就不能查田，没有查田就不能巩固土改，土改不巩固就不能有效地支持革命战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觉的斗争。对照成功经验，我们就能发现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发的斗争，甚至于去做自发斗争的尾巴。

成熟的巩固的代表会议是划分阶级的发动机。这个代表会议是议政合一的，既是地下的权力机关，又是行政机关。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例如为配合其他地方的斗争，而在狐狸集团内扩大宣传、征集物资、组织声援、收集情报等等。对于狐狸集团内死心塌地的工贼要有惩治措施。这些简单的事情并不一定局限在经济斗争，而是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地下机关，没有充分的实践是不能锻炼出才干的，没有才干是无法提炼出正确的策略与战术的。一切革命的同情者都无法越俎代庖这些事情。

除了上述的实践以及谋生，代表会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代表会议作为将来接管狐狸集团的核心，必须提高自身的革命觉悟，学习反修反复辟的革命道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革命前辈不同的是，代表会议的每一个同志的平均文化水平要远远超过前辈，也承担着比前辈更重的担子。狐狸集团绝不是一个存在于真空中的庞然大物，它也受到各种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影响，最高总裁狐狸郭也有着面临气候转变的昏招，在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薄弱环节里，代表会议越有才干则越能填补这些真空。

这些策略是建立在循序渐进上的。对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扩大红军从地方赤卫队、到地方红军再到主力红军这样一个路线，整个代表会议的发展也是组织并扩大阶级队伍的过程。如果不耐烦和群众一起做艰苦的斗争，那么很难势必倾向于一种“树大招风，一哄而起”的局面。根据这一策略再去反思以往的自发斗争，那么就会发现自发策略或者称之为“尾巴策略”的弊端在哪里。

经济斗争的结果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失败了如何退却呢？如果隐蔽并积蓄力量呢？如果通过了100次的失败，代表会议更巩固，更有才干了，更有经验了，代表会议之间的联系更广泛、密切、深入了，那么其实这不是失败，而是100次练兵造就的胜利的基础。反之，间或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却不知道第二步怎么走，或者因为这些胜利助长了崇拜自发的情绪，如果这些情绪蔓延开来，那么其实这不胜利，而是道路越走越窄了。

另外一种错误的策略重形式而不重内容。NGO组织开张了，注册公司，寻找办公场地，然后通过媒体轰轰烈烈宣传一把。给敌人以口实，什么“非法经营”，“偷税漏税”，都可以扣上来。为了维持了这些形式而耗费了有限的人力与物力。这也是想打“堂堂之仗”的策略，“乞丐与龙王比宝”的策略。

以上说的是与“代表会议”相关的策略，下面再谈一下阶级划分中的若干策略。A、B1、B2的所谓管理，不能算作劳动，特别是A这一层，其奢华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主席在1933年10月为纠正在土改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当时是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先看分析地主这一节：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占用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靠剥削工人生，叫做资本家。所以对资本家的剥夺，首先是剥夺其生产资料，在狐狸集团里就是要先让他们靠边站，等候处理。很多资本家宣布自己是“1元薪酬”，既有作秀的成分，又有避税逃税的成分。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有其权益，通常以占股的方式获得分红，那么首先就是剥夺这种权益，归狐狸集团的全体工人所有。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指挥B、C、D、E的权力，靠边站，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才是对资本家的财产收入进行分析，追索剥削收入。正如我们在历史经验里转述《工人造反报》的“紧急通令”，“不是首先造‘钱’的反”，不是“为加工资而造反”。

#### 四. 先锋队

不同的时代的先锋队面临不同时代的特殊矛盾。

在列宁的时代，列宁首先是要面对俄国的那些老前辈，他们形成了一系列工作习惯与工作传统，从普列汉诺夫到民粹派都指责列宁是异想天开。普列汉诺夫更是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固步自封于德国党的所谓成功的经验。这种尖锐对立在于：职业革命家一向是以专业角度看待革命这项事业，历来如此。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革命与分析革命，促成革命。德国党完全走向了反面，他们有着庞大的分工与细密的工作计划。但是这样一个大党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前显示出十足的废料。所以说列宁的《怎么办》首先是赋予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魂魄，有了革命之魂，才能干革命之事。否则庞大的分工与相当数量的全职工作者，只会成为革命的包袱。

在毛主席的时代，有苏联的成功经验摆在面前，但是否能移植到中国的环境里呢？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这些人都证明了自己是十足的废料，他们不能在中国舞台唱中国戏，他们只是传声筒式的人物。比起提线木偶来，他们只是多一些革命的词汇而已。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按照中国的规律来办：没有指挥权和领导权，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就不能形成正确路线。北伐大革命期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期间，不管是党内斗争还是党外合作，脱离了革命的谋略，就不能引导革命的胜利。上井冈山是谋略，长征是谋略，西安事变是谋略，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是谋略，解放战争与国民党争夺天下也是谋略。什么是谋略？就是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办法。办法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没有课堂里老师的专门传授，完全是要植根于革命实践中。

到了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执政党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是中国在二流帝国主义的位置上继续往上走，这是外部环境，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清楚，哪怕一些人物口头上有再多的左翼词汇，他们要走的路和革命是完全不相干的。如果硬拉着一起走，也不会有结果。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睿智地分析过这种现象：“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所以我们和各种泛左翼决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团不团结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态度野蛮，压制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革命的人总要在在一起的，不革命的人总要离开的。

革命与改良是不同的质。我们不能认为：改良走投无路时自然就会投奔革命阵营。这种想法是主观主义的。正如《矛盾论》里举过的那个例子“鸡蛋不可能变为石头”。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革命与改良没有同一性。列宁在《怎么办》提过一个例子：“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这段话是非常石破天惊的，极其大胆：工人自发的斗争只可能是改良主义的。而一些改良主义者愚蠢就愚蠢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也即所谓改良好像是在为革命做准备一样，他们试图找到“革命与改良的有同一性”。然而注定是要失败的。

革命与改良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从局部片段上来说也是差异性大于相似性。不能把南街村当成井冈山，南街村有南街村的政治，井冈山有井冈山的政治，这两者不具有同一性。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为了改良国民党而存在，改良国民党的叫改组派。事物一时一地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本质在一时一地为什么会呈现那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刨根问底，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学习态度。解决任何具体的矛盾，都要了解其特殊的规律。不要违背规律，而是要利用规律，尊重规律，掌握规律。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却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

那么，我们时代的先锋队要掌握的特殊矛盾是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一段话可以解开我们时代的谜团。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所以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每一个愿意真正践行马列毛主义的人，都应该明白革命的扫帚哲学。很多东西也许长得像不像扫帚，但是功能和扫帚一样，或者把功能拆开来，将来必要的时候再组合起来。也许不叫扫帚，而是叫吸尘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叫了扫帚会引来反动派的嫉恨，这将不利于扫灰尘。总而言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项梁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项羽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郡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后来等到真要起义的时候，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了。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项梁分别委任郡中豪杰做军队的干部。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前些日子某家办丧事，我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没有办成，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敬服。项梁用了一把扫帚叫做“办丧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要一把扫帚，但是不能明说。

盲动者和投降者是不懂扫帚哲学的。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所揭露的那样：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

我们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革命的事业是不能半途而废的。革命事业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援的，换而言之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事情做不好，是无法进阶到第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留下来的精华就是第二阶段立脚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们时代的先锋队所要付诸实践的全部内容。

